

在中国，省会一般意味着省内最优资源和最高话语权，但因财力不济而被同省其它少壮派城市挑战的也有不少。而像南宁这样既是经济老大又是省内首府，又混的那么差的省会倒是不多见，也可以说只此一家。

广西的建制起源于秦时期的桂林郡和象郡，而如今该省“桂”的简称仿佛在时刻提醒着南宁历史上非嫡出的身份。

南宁的经济总量早已排名省内第一，但是这仍然阻挡不了“桂林阔子、柳州棍子、南宁巴子（乡巴佬）”的经典谚语流传数百年。兄弟城市相互挤兑起来，也挺不留口德的。

在西安、重庆等城市凭借短视频大火的当下，“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蓝瘦香菇”等魔性南普（南宁普通话）早已在互联网成为一种现象级文化成功出道，但是南宁这座城市本身存在感却一直很低。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南宁这样的境遇？低调如此的南宁到底是座什么样的城市？让我们先从广西省会几度易手开始说起。



南宁及其周边 地图来源：Google earth 制图：搜狐城市

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开放北海、芜湖等地为通商口岸。自此，帝国主义开始直接对广西进行海上侵略。而事实上在条约签订之前的1863年，英国轮船就开始定期往返于北海和广东沿海港口。

此时，距离海洋更近的南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税务处批准南宁于次年开辟为沿江通商口岸，南宁正式开启了依托江海进入现代化的进程。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相对桂林，南宁不仅离海洋更近，还离东南亚各国尤其是越南更近。在封建王朝早期，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部的“烟瘴荒蛮之地”广西自然不受重视，就连省会也选在了距内陆腹地和中央王权更近的桂林。但当边患骤起、海洋时代来临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在越南开打的中法战争结束后，南宁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加上开埠之后经济实力的上升，广西省会南迁的动议终于被提了出来。

因“勤王”有功而成为清末重臣的广西人岑春煊，极力主张将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但彼时焦头烂额的朝廷还有更棘手的事情要处理，还没等迁省会，大清就亡了。1912年，在广西大权独揽的桂系军阀头子、南宁人陆荣廷不顾反对，直接将省会迁至南宁，效率极高。

对于省会南迁，陆荣廷辩解道：“迁省到南宁，并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全省人民，为了便于治理全省，为了兼顾国防。”作为军阀斗争的政治表现之一，省会南迁“不为个人”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更重要的是，迁省的确便于治理全省，且兼顾国防。

于是，1912年，南宁第一次成为广西省会，并且持续了24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与桂系军阀握手言和。出于抗战的准备和安全的考虑，1936年，广西的省会又回了桂林。接下来就到了1949年广西解放，南宁再次到了命运转折点的时刻了。

1949年，广西解放前夕，省会的设置就成为了重要议题。桂林、柳州、和南宁同时进入备选。惊险的是，这场广西C位之争，南宁一开始并不占优。

桂林是传统文化名城，名气大、历史底蕴深厚；柳州作为广西地理上的中心，工业有基础，铁路可通湘、黔，水路直达粤、港，公路也方便。此时的南宁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铁路不通、通讯落后。在此背景下，广西的省会在当时花落谁家还真说不定。

然而，当时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完全摆脱对外战争之虞，国防自然被放在了最高优先级。加上海权时代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沿江、靠海、临近越南的南宁再次脱颖而出。此后不久便发生的援越抗法、抗美，更加证明了选择南宁的正确性。

但是，战争毕竟只是特殊情况，稳定时期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觉得已经成为省会的南宁经济发展也“稳了”。



广西的夜市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来到南宁，逛了夜市之后写了一篇散文投给了《广西文学》。其中写到南宁的饮食时有这么一句话：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下走的除了草鞋不吃，什么都吃……怎么说呢，南宁和广东，连被地域黑的点都那么相似。

除了饮食，南宁还和广东共享语言。在南宁以及广西，粤语被称为“白话”，很早就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之一。有了语言这个载体，文化的传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广东文化对于南宁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广东的移民浪潮。

在中国，广东人会经商是出了名的。历史上粤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三大商帮”，明清时期，粤商的地步遍布全国。与广东相近的广西以及南宁则近水楼台。

明代开始，粤商开始“成批抵达”南宁。到了清代，粤商势力日盛，并形成了最早的广府人聚居区。到了近代，粤商开始掌握广西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实力有多强呢？

据史料记载，民国23年（1934年），南宁城区共有商店979家，资本共895269元。资本属外省商人者共计299家，其中粤商为最多，为258家，占外省商人开设商铺总数的86%，处于绝对领先。此外，在百货批零、洋货、燃料、金融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粤商占据着绝对主导。

随着日军大举侵华导致大批广东人逃难到南宁，广东因素对南宁的“渗透”开始从商人逐步到达社会的各个层面。

根据统计，民国24年（1935年），广西公务员为3930人，其中广东籍的占了302人。南宁共有歌妓156人，其中粤籍9人；娼妓共74人，其中粤籍33人。这标志着，传统等级观念中最高层的公务员和最底层的特殊职业的广东人已经遍布南宁，南宁全面“粤化”。

1933年后，粤语逐渐取代邕州官话和当地原生平话，成为南宁城区主要的交际语言；粤剧也在30年代的南宁达到鼎盛；起源于广州的骑楼在南宁街头大量出现；起源于广东的瓦煲饭（煲仔饭）也成为南宁的特色小吃之一……

以金钱为最大原生动力，以语言为最佳载体，广东文化对南宁进行了全方位席卷。如果说南宁没有自己的特色，那南宁人是不会答应的。



周某盗窃被抓后语出惊人 爆红网络

可以看到，南宁表现出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融合度和强大的自我进化能力。但是，南宁的经济就没那么幸运了。

彷徨的南宁经济

2014年4月27日，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一审公开宣判“1.18”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系列案。该系列案件共118名被告人，传销体系成员超1900人，网络层级超过40级，涉案金额达23亿人民币。被列为“广西一号传销大案”。

1989年，传销从日本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发展出南北两派，广西就成为了南派传销的发源地。2015年，反传销协会发布的一份“中国传销分布图”显示，南宁为传销高发地之一。而更为讽刺的是，传销分子经常用来招摇撞骗的幌子之一，就是以南宁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北部湾经济开发区。

很长时期以来，南宁的传销肆虐和经济基础差就一直被人诟病，甚至有说法称，南宁为了GDP而对传销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南宁传销严重不假，但是官方对此放任自流则过于阴谋论了。南宁经济基础差也是事实，但是它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西整体的工业基础都极为薄弱，除有色金属、森工采伐、几处小煤矿和17家装机容量不足1万千瓦的小火电外，近代工业几乎空白。如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战备需要，广西的经济发展就被放在了比较低的优先级。这样一来，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经济就和别的地区进一步拉开了差距。

广西，坐不住了。

1958年后，中央决定对广西工业给予适当支持，但是首先获益的，却是柳州。广西在中央支持下建设了柳州钢铁厂、柳州化肥厂和西津水电站。到了1960年，中央决定安排108个工厂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上海工业支援广西工业建设的高潮。

随后，上海16家轻化工厂迁至广西，为此，广西拨款160万元为上海16家企业建造厂房和宿舍。经过积极争取，共有7个厂落户南宁，其余厂区分布分别为桂林市4个厂，柳州市3个厂，梧州市2个厂。但是，这些内迁的工厂，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命运。

比如柳州针织总厂在20世纪80年代，稳居广西针织行业首位，是广西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也是全国十大针织企业之一；桂林制药厂位列广西18家企业之首，是广西最大的综合型化学合成制药厂；而南宁的代表企业南宁罐头食品厂虽然在80年代位列行业前列，但却在1998年由于连年亏损而宣布破产。

总体来讲，上海企业内迁对广西整体工业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柳州工业发展要超过南宁。

根据2018年的数据，南宁以3707.39亿GDP位列全省第一，但是人均GDP却低于防城港、柳州、北海位居第四。第二产业1225亿元，低于柳州的1609亿元。根据此前官方公布的2011-2017年一季度规上工业总产值的发展趋势，除2017年小幅回升外，自2012年起连续5年处于下降态势。

与此同时，南宁的“星辰大海征程”也并不容易。

且不说中越北部湾海上边界问题到2006年才彻底解决，即使中国与东盟的联系加强、北部湾发展成为重大国家发展规划之后，南宁的发展效果也有反复。

根据2019年1-9月数据，在南宁三大经济开发区中，高新区、经开区两区产值分别同比增长1.5%和5.5%，而与之相较，东盟经开区产值却同比下降了12.2%。

南宁的经济，仍在彷徨。